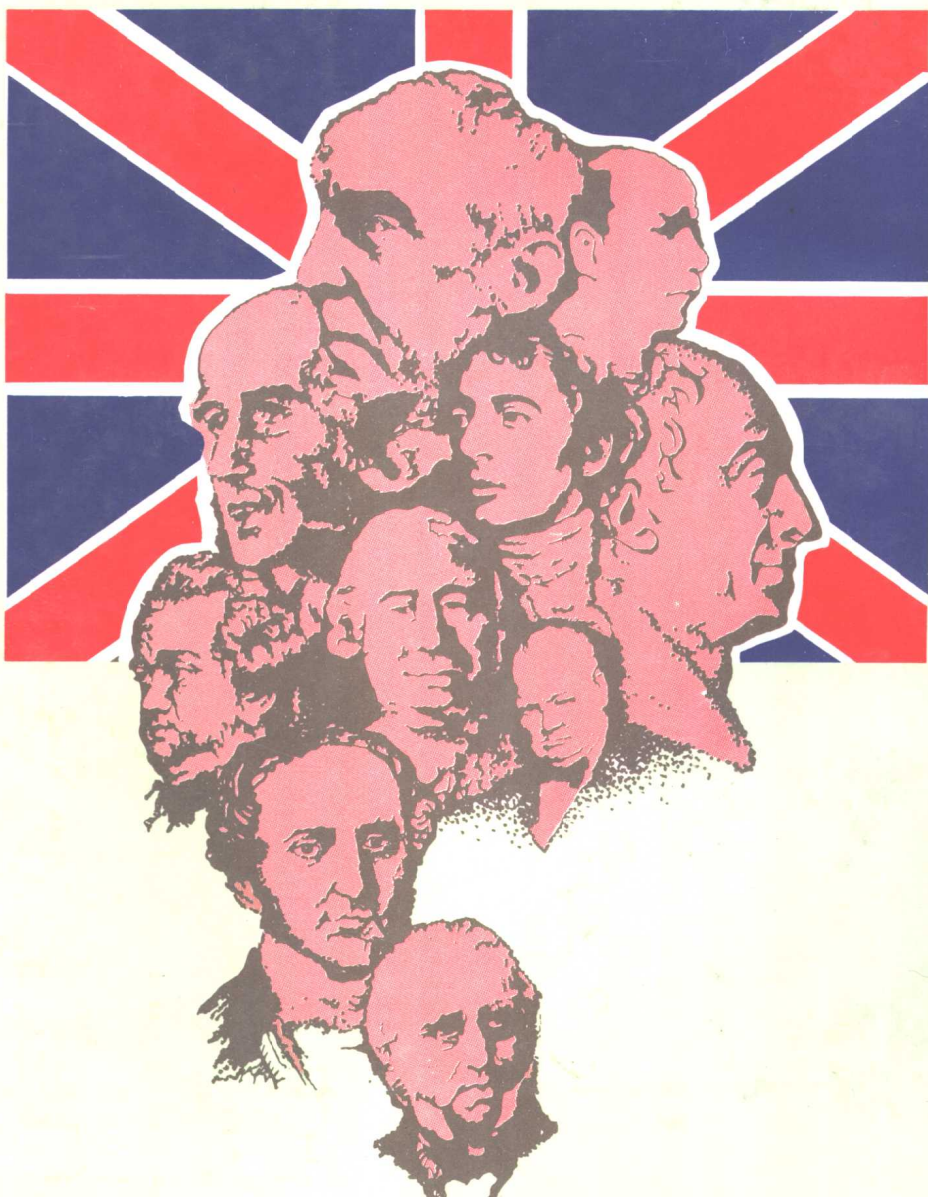


英國十大史學宗師

L. M. Angus-Butterworth 著
張 永 遜 譯



311
037
131
史學叢書 ②

英國十大史學宗師

Ten Master Historians

L. M. Angus-Butterworth 著

張 永 遜 譯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740 (71-62)

英 國 十 大 史 學 宗 師

著 作 者：安 格 斯·拔 特 沃 茲

翻 譯 者：張 永 遜

出 版 者：黎 明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出 版 事 業 登 記 臺 業 字 第 一 八 五 號

總發行所：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 市 部：

臺 北 市 信 義 路 二 段 二 一 三 號

臺 北 市 長 安 東 路 一 段 五 十 六 號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四 十 九 號

臺 北 市 林 森 南 路 一 〇 七 號 文 化 大 樓

高 雄 市 五 福 四 路 九 十 五 號

郵 政 劃 撥 帳 戶 一 八 〇 六 一 號

印 刷 者：海 王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地 址：臺 北 縣 中 和 市 民 有 街 35 號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十 月 初 版

定 價：新 台 幣 捌 拾 元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英國十大史學宗師

目錄

原作者序

本書對於經過評選的史學家，已經表示了若干挑戰性的看法。

亞當·史密斯兼為思想家及創始人，其想像力是如此豐富，因之，在他寫作之時，未被看作歷史學家；個中原因，泰半由於他的志趣超出在當時視為史學的狹隘範圍。然而經濟史發展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大枝幹，則給了他名列史學宗師的權利。

戈德斯密思是在其他方面天賦極高因而如此知名的作家，以致他作史學家的崇高成就，反而久已其名不彰。然而他具有上乘近代英國史學家的資格（與蘇格蘭籍者不同），因此，是本書的當然入選人。他完全以史學家的身份受到評介，顯然尚屬首次。

本書一則對亞當·史密斯和戈德斯密思予以推崇，對通常較受忽視的史學家，如符汝德等人更加充份重視，在另一方面，願將在若干情形之下，被大家評價過高的人重加檢討。參考來對其同代人欺名盜世，順利如此，早已成為受人嚴厲批評的目標——雖然他的悟性是如何平庸，至今才得確定。相形之下，吉朋的名氣比較持久，然而對他重新估價，此正其時。

甚至各主要史學家的地位自然也差別甚大。素希雖然不像某些人士一樣的出

名，但是他的著作在巴西史這個特別範疇獨樹一幟，加以令人心折的人格，也是適合作為研究目標的附帶客或次要的理由；因此，他的入選是理所當然。

此外，新明星的確有時會在天際出現，雖然要經過很久的時間。邱吉爾的成為史學宗師，是如此晚近，因此介紹他的一般性傳記雖然時有出版，但專談他史學工作的論著，尚付厥如。

各大史學家對於傳統的神學，顯然時常加以銳利的批評。若干早期人物，如休謨吉朋，對於討論教會的階級組織，周詳慎重，然而儘管如此，仍然令人感到（他們）對教會的敵意。在後期人物當中，符汝德和格勻（對教會）未加警惕，因之受到不公平的遭遇。而且尤以前者為最。

各位人士的品格和個性大不相同，而且在時間上和環境上相去久遠，然而他們在廣泛的理性看法上，則是如此一致，未可輕忽視之。

本書限於範圍，無法把英語民族的全部成名作家，一律包羅介紹。增列其他人選，乃屬賞心樂事，但入選人則在多方面具備最佳條件——著作的品質、志趣、看法和人格的健全性等皆是。

本書完全以衡量個人及其作品，瞭解其寫作史書的原委，以及如何着手為目的。此項工作，引人入勝。

譯序

本書為英國史學家 L. M. 安格斯——拔特沃茲所著。譯者未揣譎陋，遂譯介紹，理由有三：

其一、本書作者對於「記載既往」，強調兼重科學性及文學性，同時引述美國史學家艾包特認為治史「需要思想」的名言，頗見簡要中肯。

太史公作史記，自稱在於「述往事，思來者」。「述往事」需要以科學的方法處理史料，以文學之筆撰寫，進而以此為依據，運用思想，而達「思來者」的目的。因此，「科學，文學，思想」等三項要求，不僅是可作衡量史學著作的標準，也是治史人必備的修養和能力。

例如，亞當·史密斯撰寫「國富論」一書，係以觀察事實為根本，獲得結論，推翻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學說，成為發揮史學功能的實例。史密斯向以創始近代經濟學享名，而本書作者則以獨到的見解，列史氏為英國十大史學宗師之一，確見高明。

其二、本書有助於對英國近代史的了解。十位史學大師分別代表英國自十八世紀以來的各個重要時期；了解其生平 and 所處的時代背景，可對史學研究發現新的角度和研究的捷徑。

以年代區分，大衛·休謨、亞當·史密斯、歐立吾·戈德斯密思、和艾德華·吉朋都屬於十八世紀「理性時代」；若貝特·素希屬於「理性時代」後期和「浪漫主義時代」；韋廉·普瑞士考特、麥考來、傑模士·符汝德和約翰·格勻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溫士敦·邱吉爾兼跨「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和「現代英國文學時代」。

從休謨出生至邱吉爾逝世，其間共計二五四年；如從休謨的第一部著作「人性論」出版的年份（一八三七）起算，至邱吉爾在青年時代寫南非戰爭的著作出版之年為止（一九〇〇），共計一六三年。英國在這段時期之內，奠定近代史學的基礎，進而發生世界性的影響，同時國力日盛，在多方面稱冠全球。

在清朝，這段時期正是乾隆朝初年至光緒朝末期。在「鴉片戰爭」前後，若干中英關係史上的大事，均在這段時期發生。清朝與英國在國勢上的此消彼長，實例不一而足，而史學的興衰可稱其中之一。因此，純自實用的觀點而言，此一時期特別具有研究的價值，而本書適可作為參考書籍。

其三、本書對於十位史學大師的才賦、風格、歷練、氣度分舉實例，加以評介

，並對其成就，根據作者強調的尺度，或褒或貶，均能公允客觀，有助於了解各位史學大師的修養和英國史學發展的過程。

十人之中，多數並非專攻史學出身。例如休謨為「懷疑主義」哲學的創始人；戈德斯密思在詩、小說、戲劇方面為十八世紀英國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然而均在史學方面卓有大成；個中原因，在於能以哲學家 and 文學家的觀點，觀察人生，掌握歷史發展的重點，更能廣博深遠，不致過份偏重科學性的要求，流於狹義、刻板。

吉朋等五人都是撰寫非英語民族的歷史而成就鉅著。此一現象可能由於承續「文藝復興」的遺風餘韻，同時在心理上受到英國國力向外擴張的影響，然而似乎也可作為各位史學家的胸襟、器識，恢宏開通的證明。尤以素希於一八一〇至一九一九年，亦即距今一七〇年前，以十年光陰寫成「巴西史」，而僅得相當一篇文章的稿酬，可見其淡泊致遠，不求急功近利的風範。

符汝德寫「十六世紀衣利沙白時代海員列傳」，格勻寫「英國民族史」，都是別開新題，開風氣之先。

作者認為吉朋和麥考來的著作長於文筆，而遜於科學精神，亦即「辭不勝理」；邱吉爾史書著作之豐富，超越前人，他自承早年曾讀麥考來的作品，而能了解他的弱點。邱氏在格勻的「英國民族史」出版六十年之後，以二十年的時間，寫成「英語民族史」，為英國史學擴展了更大的範圍，樹立了更新的標準。從這一類事例，

不僅可以了解各史學大師的寫作過程，也可以看出英國史學潛移默化的連綿關係。

本書譯文前承「文藝月刊」連續刊載；又蒙黎明公司出版專書，併此致謝！對於提倡學術研究的精神，深感欽佩！

譯者謹識

張永遜：

菲律賓馬尼刺亞典耀大學研究院畢業。對西洋史及東南亞民族史有精湛之研究，近十年來，專攻英國依利莎白及維多利亞時代史。其中英文著作散見於國內外各大報刊。張氏利用其在商務上旅行之便，實地攷察各國史跡，故其史學論文，不僅可讀性高，且能發人之所未見。

原作者序

譯序

第一章	變遷中的史學觀念	一
第二章	大衛·休謨（一七一——一七七六）	五
第三章	亞當·史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	二三
第四章	戈德斯密思（一七二八——一七七四）	三七
第五章	吉朋（一七三七——一七九四）	五五
第六章	素布（一七七四——一八四三）	七九
第七章	普瑞士考特（一七九六——一八五九）	九九
第八章	參考來（一八〇〇——一八五九）	一七
第九章	符汝德（一八一八——一八九四）	三五
第十章	格勻（一八三七——一八八三）	五三
第十一章	邱吉爾（一八七四——一九六五）	七一
著作表	附出版年份	一八九
參考書籍及說明		一九七

第一章 變遷中的史學觀念

近代歷史學的觀念，與早期英、法編年史家紀事的性質，顯然有了很大的距離；在另一方面，它與古代「史學家」的著作越發相去遙遠，自然無可置疑。

如果，我們研究希臘的作家，便可發現他們的（寫作）範圍極其有限；例如修西底地斯（Thucydides; 471—400 B. C.）以伯羅奔尼撒戰事作為寫作的題目，但是，對其他有關事件則是一概棄之不顧。

拔力（J. B. Bury）稱讚諾芬「才賦中平，缺乏深入表裏的能力」。美國女作家貝慈·格阮（Bessie Graham）進而溯本追源；她在談到希羅多德（Herodotus; 500 B. C.——西洋史學之父）時說道：「他沒有追求來源和證據的近代觀念。（在當時）考古學尚未發軔，因此，他專靠民間的傳說和早期詩歌的紀述，並把他讀到的和聽到的配合他的解釋，結果把史學著作作用平淡無奇的談話方式寫成故事書。」（在那個時代），尚未具備現代知識的全球性範圍和豐富領域，我

們在今天看得平常的學識來源，在當時並未存在。

編年史家根據親身的經驗，或目睹人的口述，記載重要事件，實踐了基本的史學任務。他們是史學界的先驅；但是，他們的觀念則（與今日）十分不同。我們可以在他們的身上看出清晰可見的演變。（例如）在十四世紀末和十五世紀初期，論流風餘韻勝於約翰·弗若者寥寥無幾，他的著作價值宏偉；然而，在我們看來，他不過是一位編年史家而已。

在十七世紀之前，編年史學家克拉雲登保存了很多編年史家的傳統特色，同時在若干方面符合現代史學家面臨的苛刻要求。到了二十世紀，邱吉爾仍然持續編年史家的寶貴特徵；不過，他却是一位真正的歷史學家。他一面紀述了他親身經歷的事件，另則運用圓熟的技巧，引用全球性的資料；職是之故，今天的史料才經得起一再考訂、覆按，確保最高度的精確標準。他引用國內以及來自同盟國和敵人的記載，以十分完整的文獻方式，為他的敘述提供了充份的證據，同時以得天獨厚的眼光和恢宏的公正無私為後代落筆。

紀載既往，包含兩項主要的程序：其一是先要探討事實，通常最好是用科學的方法達成；其次是要把得到的資料用文學的體裁表達，這是一件在比較上屬於藝術性的事項。因此，歷史學可以視為科學與藝術的綜合。我們也要注意到這兩種成份的比例並非固定不變的；此外，史學家已經一再在他們的研究工作方面，強調科學性精確的需要。

早期的史學著作揉合了大量的演義成份。批評的精神尚未覺醒，民間傳說和傳奇故事，至少和正史受到同樣的重視。這一類的行文敘事如果並非信而可徵，則是既生動而又多彩多姿，因此

趣味橫生，成為文學的一個支派。

在目前，我們正好是反其道而行，史學研究的成果似乎是只限於採集資料，拘泥一格，看來不僅呆板，而且瑣碎駁雜。此外，沒有特別文學天份的史學家，自然難免以妒忌的眼光來看有天份的同道，同時懷疑寫得好的作品不够紮實。

哈佛大學教授韋勃·艾包特（Prof Wilbur Cortez Abbott），是美國史學界的重鎮，曾對膠柱鼓瑟的寫法提出警告。他說：「有人才有歷史，而且，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都是最通人情的。」「歷史學不僅是事實的累積；它並非札記和資料的堆砌；它並非終生孜孜不倦的產物而已。它需要在閱讀浩如烟海的書籍、手稿，旁徵博引參考資料之外，再有其他的能力。它需要心、眼、手並用。沒有思想，它不過是共鳴的銅樂器和其聲叮嚀的鐃鈸，既不搭調，而又嘈雜刺耳。沒有通達的思路，它會變成一片混亂的空白，毫無格調可言。」

不僅要在認為適當的史學題材當中觀察變化，對所用的語文也是一樣。長久以來，古典派的偏失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比較自由的體裁則已逐漸形成。李果易教授在批評克來雲登所著「英國起義及內戰史」時說道：「它在風格上是屬於傳統派的；長句子在形式上連綿不休，斷落（的用法）上承拉丁時期，進而邁向短而簡練的句形，不過仍未爐火純青，因之構成呆板的後果。」在事實上，直到事過多時，才能進一步的完全擺脫這種束縛。

吉朋顯然偏好拉丁字源的辭彙，他慣用浮誇華麗的詞句，增加文章的韻味，似乎鋪張到難以悅目的程度。在這一方面，他和麥考來是無分軒輊。喀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

也是陷於這種既不近人情，又自虐得出奇，而且史無先例的文體到了無法自拔的程度，以致難以自我表達。

然而，在過去一百年間，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語法，發揮了天賦的勁道，而自成一格，先有符汝德（Froude; 1818—1894）和哥潤（Green; 1836—1882）的出現，同時又有邱吉爾與狄福的一脈相承。

談到史學的藝術和科學成份，可知偉大的史學家都不是以專攻史學爲業。他們在有成之年，致力歷史學的研究和撰寫歷史著作；他們兼理其他工作，而且他們在早年所受的教育、訓練，和興趣都是偏重其他方面。在文學界也有類似的情況；各偉大的劇作家、詩人，或小說家也都是學非所用。然而，不論史學家或小說家都要了解人性，對人類的動機具有實際經驗，因爲研究的對象在根本上便是廣泛的人生問題。解釋事件需要透過同情性的觀察力。如此說來，歷史學的藝術成分誠然多於科學成分，而且甚至可以想像到強迫天賦優異的史學家接受過多的正規教育，反而會使得他成爲平庸的史學家。

經濟史是個例外。經濟史在科學成分超過一般史學，因此從事經濟史研究的條件有所不同。經濟史自發軔時期開始，便屬於學院派的專用範圍，研究的機會多半尙待開拓，成爲治史學人難得的寶貴領域。



第二章 大衛·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寫歷史，需要對人與事的廣泛知識和經驗。缺少這類適當的背景，解釋前代思想和行動的工作，顯然有難以克服的困難。

大衛·休謨在充份成熟和才力達於巔峯時從事史學，在此之前，已在其他方面有了輝煌的成就。索邦內（大學）的艾米爾·雷古思教授精確地稱他為「十八世紀中葉這段重要時期歐洲最偉大的思想家」。希爾·勃頓說：「他的哲學有如此傑出的氣質，而且如此清新果斷，因之，「他使得哲學家們一致工作起來，或則反駁他說的話，或則嚴肅地填補他所發現的空白。」

休謨系出名門。他是休謨伯爵次子的後裔。休謨說過：「把這個姓氏拼成 Hume 的這個成例由來已久，直到文藝復興前後，仍然如此，而且極為普遍；後來經常拼成 Home，讀音不同。」

在這位史學家的前輩親族當中，有很多人享有盛名。亞力山大·休謨爵士曾於一四五〇年任